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



张西平〇主编

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中国学)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西平 李彦姝 主编

學苑出版社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

张西平○主编

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中国学)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西平 李彦姝 主 编
王广生 副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西平,李彦姝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9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张西平主编)

ISBN 978-7-5077-5558-9

I. ①论…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中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6333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杨 雷

编 辑: 张敏娜

印制总监: 张 翔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销售部)、010-67603091(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主编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

李彦姝，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现就职于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

责任编辑：杨 雷
编 辑：张敏娜
封面设计：王雪莲

总序

今天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理论都是西方在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这些构成了西方话语权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强大起来的西方将其成功归于其文化的支撑，在中国近代最流行的就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东方走向现代化只有走西方之路，只有批判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这样的一种西方文化优越论一直桎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这种认识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东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之根，同时也长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导师，只是到了 19 世纪西方取得了世界发展的领导权后，他们开始掩盖这一切，将西方文化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伟大文化，甚至将白种人说成一种优于其他人种的种族。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盛行。

只有打破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话语的权威，从历史上揭示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以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抚育和影响，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之根。如黑格尔所说：“欧洲人只要一提到希腊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家乡之感。”西方哲学家们都将希腊称为欧洲文化的童年。实际上，希腊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埃及文化、亚述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这点，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过：“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记载过了；我因此不增加什么东西，而是接着提到几点别人没有讨论过的东西。”^①他还认为，

①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 年，V1. 55。

希腊的纪念仪式、习俗都是从埃及搬来的。希腊人是从埃及那里学会了“占卜术，并将他在埃及学到的许多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希腊……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①。为何希腊和埃及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呢，因为埃及曾经殖民过希腊，这些有着历史学的根据，在希腊悲剧中仍可找到大量的埃及古代语言的残存。实际上，近东的亚述、苏美尔，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文明。“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雏形；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起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人本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②

希腊正是从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学习到了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当然，科学技术也随之才成长起来。希腊从巴比伦学到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学到巴比伦人发明的水钟、日冕和把一天分成十二部分的方法，学到巴比伦人观测到的黄道和黄道十二宫图，还学到了埃及的几何学、日历和医学。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完全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为世人所羨，但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为更为清晰地表达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明确地说：巴比伦与亚述文明是西方的祖先，东方是西方文化之根，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只是到了19世纪，西方开始将自己和东方文化分开，将埃及人说成和欧洲人

① 转引自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11年，第84页。

②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一样快活、热爱享乐、孩子气地爱吹牛。他们编造出希腊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的，它和腓尼基人以及亚述、苏尔美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说”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文明的起源是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希腊是进入不了这个圈的。四大古文明中早已经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希腊文明只是在古巴比伦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率先走向现代化，在它们强大起来以后，开始慢慢地修改历史，将自己的发展和成就说成是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与其他文化没有关系。例如欧洲近代进步的起源文艺复兴，但这和东方没有什么关系。

“欧洲并没有从东方汲取什么创造现代科学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借鉴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它被融入了欧洲的理性传统之中，当然，这些理性传统是在（古）希腊创建的。”^①显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希腊的典籍在中世纪后已经很难找到，希腊思想和文化的保存在于阿拉伯的百年译经运动，他们将希腊的文献绝大多数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文艺复兴就是将这些阿拉伯文的希腊文献重新翻译回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从中发挥出新的思想。一些欧洲中心论者认为，阿拉伯人并未有多少新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保存下来了希腊的文献。这种傲慢的态度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因为阿拉伯学者并不仅仅翻译了希腊的文献，他们也从波斯、印度（以及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医学、数学、哲学、神学、文学和诗歌方面的成就。“然后，他们在犹太科学家和翻译家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希腊知识的简单整合，也是对希腊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使它们在新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②这个过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巴格达处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它不仅接受了新的亚洲思想，而且对其重新改造，然后传播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这点，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他们说：“西方人发现穆斯林所拥有的缜密思维和渊博学识，远远超过了从古罗马那里所获得的……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

①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②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57页。

外族遗产了，除非是希腊人在公元前6世纪就汲取了这些东方（埃及）文明。”^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欧洲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两个重要环节，而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变革都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翻译成欧洲语言，在欧洲各国出版后，在欧洲逐步形成了18世纪的中国热。中国热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② 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风尚。Chinoiserie，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③。

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介绍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从思想而言，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从此斯宾诺莎只能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靠磨眼镜片为生。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

①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57页。

② [英] S. A. M. 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75—276页。Berger, Willy 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 Cologne: Böhlau, 1990. Chen Shouyi, "The Chinese Gard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ien Hsia Monthly* 2 (1936), pp. 321-339; repr.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9-357.

③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严建强《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

督教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是当时唯一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① 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有其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他看到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是很明确的。^②

如果说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那么伏尔泰则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的中国纪年，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界的轰动，中国的这些纪年彻底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纪年。^③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④ 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而伏尔泰这位 18 世纪启蒙的领袖是穿着孔子的外套出场的，他的书房叫“孔庙”，他的笔名是“孔庙大住持”。^⑤

我们必须看到，这段历史不仅说明“中国的‘遗产’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遗产’已结合起来，显然纳入了一条正在实现世界合作大同的轨道”^⑥，从而彰显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同时对我们自身来说，“这段历史又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完全与近现代社会完全相冲突的，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并不是与现代思想根本对立的，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先哲的思想中有许多同希腊文明一样永恒的东西，有许多观念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普世性。只要我们进

① 艾田浦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37 页。

② [德]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大象出版社，2005 年；李文潮编《莱布尼茨与中国》，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③ 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④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371 页。

⑤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张国刚、吴莉苇《欧洲启蒙时期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0 年。

⑥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54、268 页。

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东方在世界体系中也并非无足轻重，在西方走向世界时，东方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①。所以，揭示出启蒙时期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说明欧洲思想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仅仅回到希腊，西方思想家发展不出来近代的启蒙思想观念。

通过历史说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历史渊源，破除 19 世纪以来将西方文化说成自我成圣的神话，解除掉西方文化所披覆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成一个地域性文化，化解那种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化文化的神话，这是我们走向文化自信的第一步。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不是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不是停止学习优秀西方文化的步伐，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让我们在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的交流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

《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

^①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492 页。

目 录

一、国际汉学研究

- 我和汉学研究 阎纯德 (3)
- 论木村正辞的《文馆词林》写本研究 王晓平 (10)
- 卜弥格与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
- 简论卜弥格与雷慕莎的学术连接 张西平 (26)
- 从高第书目到 Bibliotheca Sinica 2.0
- 兼论数字化与汉学史研究 王国强 (48)
- 海外汉学家的“个人身份认同”与学术“洞见”和“偏见”
- 之间的关联——以周蕾的女性主义观点为考察对象 张清芳 (58)
- 日本学者根山彻的《牡丹亭》研究 罗小东 (70)
- 差距、转换与思想的方法：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研究对我们的
- 启示——以弗朗索瓦·于连的思考路径为例 葛桂录 (76)

二、典籍外译研究

- 理解意义与创造意义
- 两部中国典籍外译的不凡意义和影响 方维规 (87)
-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赵 巍 (96)
- 宇文所安的学术翻译思想
- 以《韩愈和孟郊的诗》为中心 魏家海 (106)
- 中西文化的传道者：中文圣经翻译家、教育家施约瑟 刘 燕 (124)
- 《诗经》西译的演进历程 左 岩 (135)

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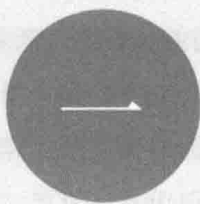
- 以《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英译与诠释为例 … 姜 哲 (148)
- 传教士翻《易》之道
- 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 熊谊华 (157)
- 中国诗歌中隐喻的法兰西解读
- 以程抱一和于连为例 …………… 海丽玮 (166)

三、跨文化研究

- 论刘若愚的“诗言志”阐释 …………… 陈彦辉 张欢欢 (177)
- 程抱一的汉学研究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初探 …………… 蒋向艳 牛竞凡 (186)
- 民国时期英文《北京导报》(1917—1931)的沉浮与特色 …………… 叶向阳 (202)
- 科举与儒学转变
- 唐人重《礼记》现象考察 …………… 徐晓峰 (222)
- “儒家角色伦理学”：由来与实质 …………… 李玉良 (248)
- 评美国汉学家海陶玮《中国文学中的个人主义》 …………… 刘丽丽 (260)
- 熊式一两部英文戏剧的上演
- 得意的《王宝川》与失意的《西厢记》 …………… 陶欣尤 (267)
- 跨文化视野下郁达夫小说《过去》研究 …………… 高 莎 (281)
- 老庄哲学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及延伸性思考 …………… 刘国利 (288)

附 录

- “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高层论坛”会议侧记 …………… (301)
- 编后记 …………… (308)



国际汉学研究

GUOJI HANXUE YANJIU

国际汉学研究

GUOJI HANXUE YANJIU

我和汉学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阎纯德

一、结缘汉学

1974年1月19日，我被派往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中文系执教，这所欧洲最大的外语学院从1795年创建以来就是法国汉学家的摇篮和大本营。法国汉学史上那些汉学巨擘，诸如儒莲、德理文、巴赞、歌士耆、冉默德、德韦理亚、叶席微、沙畹、考狄、马伯乐、葛兰言、格鲁塞、戴密微及谢和耐等，都曾在这个学校任教职。从这个学校走出的汉学家更是数不胜数。

1974年春夏之交，法国大学有一个假期，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教学与研究系主任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邀请我与另一位同事到大西洋中的著名小岛圣·米歇尔山度假三天。那时汪德迈教授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汉学家了；他精通汉语、越语和日语，在火车上，在山上，听他说中法文化关系，即是我第一次倾听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从那时起，就不断有机会与 INALCO 和其他大学的汉学家们频繁交往。

我在 INALCO 执教前后五年，当时的法国同事几乎全是颇有名气的汉学家，比如研究中国艺术的尼古拉太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于儒伯（Robert Ruhlmann，1920—1984）先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毕莎小姐、研究中国政治的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夫人、研究中国民俗的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教授等。

我在那里讲授语言课和文化课。我的文化课先后开过“鲁迅专题”“郭沫若专题”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生中有不少比我的年龄还大，有的就是汉学家，上课下课，与这些学生多有文化层面的交流。

1975年，我的同事白吉尔夫人进行国家博士论文答辩，我作为中国学者应邀

参加，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2013）、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儒伯和汪德迈等著名汉学家。同年，欧洲青年汉学家学术会议在巴黎召开，我和李忆民接到邀请后即向大使馆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汉学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是对中国的污蔑和充满敌意的东西。这种会议不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汉学是个坏东西”。

1976年春，我陪同时任INALCO中文系主任的毕莎教授宴请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教授，我们之间虽然没有深入的实际交流，但我对这位受过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曾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后因不遂蒋介石之意而被迫回国的汉学家还是充满敬佩的。他曾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于1944年还曾建议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施压调整与中共的关系。整个饭局他说话很少，几乎只听我和毕莎教授闲谈中国文学问题，但在饭局快要结束时，他似笑非笑地插进来一句既幽默又沉重的话使我记忆犹新：“我在美国受迫害，在你们中国也受迫害——既受蒋介石的迫害，也受‘文化大革命’之害。我混得不好，国内国外都不是人……”他所说的受“文革”之害，我想大概就是“文革”中油印的那本巴掌大的《拉铁摩尔反动言论》的小册子吧。

同年深秋，于儒伯教授拉着我去看望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先生，这位曾经在1927年与鲁迅同事于厦门大学的学者听了于儒伯对我的介绍，向我招了招手说：“我喜欢中国，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再去中国……”这次令我喜出望外的无声探访，可能对我关于“汉学”和“汉学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影响。

1984年至1986年，我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中文系执教，结识了译介高行健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著名汉学家若埃尔·杜特莱（Noel Dutrait），还做过他在中国研修时的“导师”，带他拜访莫言。在那里，与研究道教的伊莎贝尔教授、研究台湾高山族的专家桑达尔郑都交往密切。后来我客座波尔多第三大学时，多次拜访著有《十六七世纪中国白话小说》，译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著名汉学家、前中文系主任雷威安（André Levy）教授。

此外，我与巴黎第八大学（文森大学）的著名汉学家米舍尔·鲁阿夫人过从